

开放组织的权力与合法性

——对资源依赖与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的比较

□ 邓 锁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资源依赖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是组织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流派,前者侧重于从组织的权力策略和能动性入手,后者更重视组织为什么相似以及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两个流派皆有其不足之处,怎样将组织的能动性和制度文化的制约性结合起来,对于研究中国的组织问题十分有意义。

关键词: 资源依赖; 新制度主义;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C912,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04)04-0051-05

作者简介: 邓锁(1977—),男,湖北老河口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

收稿日期: 2004-02-22

组织理论流派纷呈,但一个大的趋势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放的、强调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组织观逐渐取代了封闭的组织系统理论,权变理论的提出给组织理论开创了新的视角,组织结构与技术、外部不确定性以及制度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受其影响,70年代后期,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新的组织流派——资源依赖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它们给组织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与管理学派强调效率、工具性行为的管理和经济取向不同,这两种理论是从组织生存合理性出发来讨论组织和环境关系问题的。前者强调组织权力,把组织视为一个政治行动者,认为组织的策略无不与组织试图获取资源,控制其他组织的权力行为有关^[1]。后者则更接近于社会学研究传统,它关注的是组织结构为什么会产生趋同性。在此,合法性机制而非效率机制对组织生存起关键的作用^{[2][3]}。组织的管理学派过于注重效率因素,没有看到组织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之中,而这恰恰是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因此后二者在今天的组织研究中引起了人们强烈兴趣。新近的许多西方组织研究沿用或发展了这两种思路,但在中国对其介绍和运用还很少见。本文试图在解释逻辑上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寻找异同点,

相信对组织研究的视角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外部控制与组织的权力策略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起源来看,较早期的学者包括扎尔德、汤普森等。普费弗与萨兰奇克的《组织的外部控制》(1978)一书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代表作。后来的研究者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比如普费弗对组织工资结构的研究,托伯特对高等教育组织分化的研究等等。

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开放系统理论为组织面向环境来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提,没有组织是自给的,都要与环境进行交换。普费弗等对以前的组织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只考虑组织内部的因素,忽视了组织的政治维度。他提出应当把组织视为政治行动者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的工作组织^[1]。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间的资源依赖产生了其他组织对特定组织的外部控制,并影响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第二是外部限制和内部的权力构造构成了组织行为的条件,并产生了组织为了摆脱外部依赖,维持组织自治度的行为^{[4](p.130)}。有的学者认为资源依赖理论不考虑

组织内部因素,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普费弗等也分析了组织内部的权力问题,能够提供资源的组织成员显然比其他成员更加重要。

资源依赖理论否定了简单的“组织工具理性”观念,普费弗等认为,帕森斯和佩罗等将组织看作实现目标的系统是有问题的,组织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连结”。组织是具备大量权力和能量的社会能动者,其中心问题是谁将控制这些能量以及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此外,与结构权变理论着重强调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资源依赖理论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分析组织怎样以合并、联合、游说或治理等方法改变环境,说明组织不再是为需要去适应环境的行动者,而要让环境来适应自身。

总的来说,资源依赖理论强调对环境的影响,强调组织间关系,是对传统组织理论的一个突破。现实组织行为中,大量的组织合并战略、组织网络行为是组织控制环境资源的实例。比如组织会通过垂直整合来消除与其他组织的共生式依赖;通过水平扩展,吸收竞争者以消除竞争中的不确定性;或者通过多样化的策略,扩展到多个领域,以避免依赖单个领域内的主导性组织等。但资源依赖理论也遭到一些批评,如它过于强调权力的控制作用,忽略了效率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实际上由于组织嵌入在社会网络和制度观念中,组织的很多行为和结构形式是约定俗成或者模仿性的,这一点新制度主义理论作了较好的补充。

二、合法性机制下的组织行为

在新制度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学对制度机制的讨论已经相当多。斯格特划分了三种对制度的不同理解,即管理的、规范的和认知的;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管理特征,认为制度是规则体系或管理体系,制度提供了经济行为的背景条件;韦伯、帕森斯、塞尔兹尼克等早期社会学家强调的是规范的制度,他们认为制度主要是规范性的结构,它为社会生活行为提供了道德框架。新制度主义区别于以前的认识,它强调认知-文化过程对于解释制度的作用^{[5](p.124)}。伯杰和卢克曼将制度化视为一个互动意义的建构过程,制度的确立包括行为者的意义赋予^[6],对新制度主义有较大的影响。迈耶则在宏观的层面上提出了组织的制度解释,代表着组织研究中

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他认为工业化社会以来的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神话,它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坚持的信念,并有力地影响了组织的形式,从而导致组织的结构不得不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他认为,在特定的组织中,参与者会通过互动来共同建构他们的社会现实^[2]。

与管理学派不同,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所关心的是组织的结构为什么会相似,即为什么会出现组织的制度趋同性现象。迈耶的论述为随后的大量讨论奠定了一个基点,我们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来认识组织,必须从合法性机制上来看待组织和环境的“同构”现象。迪玛鸠和鲍威尔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三种具体机制入手讨论了组织趋同性问题,包括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3]。祖克通过对公务员制度的采纳阶段的研究,着眼于制度化型塑组织形式的过程,具体测量了合法性机制的指标^[7]。新制度主义对组织制度趋同的研究与强调效率和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相对,体现了社会学对组织领域研究的杰出贡献。

晚近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对组织和制度的差异进行了较多经验分析。抽象地谈论组织的趋同性往往比较麻烦,因为现实生活中组织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制度环境特点也不同。迈耶和斯格特指出,市场导向的组织较少受到制度的型塑,而较多地受到技术的因素的影响。奥儒比较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组织实例,认为制度环境的特点在这几个地区是不同的,因而制度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发挥也是不同的,如台湾地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的影响,与家庭(家族)有关的制度、文化特点会对组织的成长、发展形成重要影响^[8]。这种发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说明制度并不是一个同质性、普适性的概念。周雪光则把制度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的影响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强意义的,组织或个人没有自主选择性;二是弱意义的,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9]。制度合法性机制的强弱不同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

三、制度化组织的能动性

新制度主义和资源依赖理论有三个共同点值得提出来。首先,两种理论都认为组织是开放的系统,强调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其次,都否定把组织作为工具性的目标系统来看待,强

调组织是一个松散的系统连结;最后,都强调组织生存的合理性。祖克认为,在某种情况,如政府的强力控制机制下,常常很难区分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不同解释,因此可以说这两种理论具有一定的亲近性^{[4](p.101)}。

当然,两种理论有明显的不同,这与它们分别强调权力和合法性的不同机制有关。这大概可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的权力策略,故组织策略以及引致的行为差异性显然是结果;而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的作用,重点在于解释组织的形态趋同性。二是对环境的特质的界定不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环境是由相互有差别的利益团体(组织)所构成的,它们会对组织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新制度主义把环境看作是由观念、文化、信仰、制度构成的综合体。三是与环境的关系上。资源依赖理论着重组织对环境的改变和影响,这一点前面也提及到,而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组织仍是较为被动的,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四是资源依赖理论较重视管理和组织运作的策略,新制度主义则侧重于组织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以及作为组织域而非单个的组织形态特点。

目前,组织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来说,虽然它们在理论逻辑和内容上有一些差异之处,但我们认为两者有许多方面都可以相互结合并促进。新制度主义对结构趋同的理解体现了社会学的视角,但强调相似而非差异的出发点并不能充分地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组织现象。对新制度主义的批评目前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制度主义看来,组织形式受到外部环境、模仿机制等或强或弱的合法性机制影响而趋向于同一性,组织形式的变化是被动而非主动的,那么组织形式必定只是二次的变迁或适应,问题是组织首次创新的制度动力从哪里来?制度学派能否在组织的首次变迁上做出分析的贡献,而不是笼统地归结为效率机制的作用?第二是强调组织的趋同性使研究者多将组织领域或者宏观的社会制度环境作为分析对象,缺乏对个体组织或微观制度机制的分析。这使得制度学派在解释制度创新上缺乏较有说服力的论证。

我们认为,对行动者的强调应当是理解制度问题的重要方面。斯格特指出,在组织社会学

中,“组织中的参与者首先应该是社会行动者,正是他们的努力、遵循和不顺从,构建和决定了组织的结构。”^{[5](p.18)}一方面,社会行动者保证了组织的连续性,即组织结构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变化,即创新和变革。新制度主义偏向于从制度对组织和行动者的约束来解释组织形式,对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得不够。然而,正如迪马鸠指出,“不考虑行动者的能动性,制度主义者对有关制度实践、组织形式的起源、再生产以及解体等现象无法发展出具有预测性和说服力的理论来。”^[10]

资源依赖理论较多强调组织各种策略性的行为方式。其优点就在于充分给予组织以能动性,这种思路恰好可以弥补新制度主义的不足。比如当我们研究组织的变迁行为时,在真实组织行为中,组织的行动会受到多种而非一种驱动力的作用,权力依赖是其中的重要动力机制,但是权力依赖必须与组织成员或组织行动者的价值期待联系在一起才可以发生组织的变迁。组织的权力分析和组织的制度化、合法化分析完全可以互相补充而发挥更强的解释力。

四、开放组织的运作机制与中国组织研究

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提出,使人们注意到组织问题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组织本身,而必须考虑到组织所嵌入的环境和网络关系。在对中国组织问题进行研究时,尤其需要注意两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组织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情境(包括原有的制度、规范和社会记忆系统)以及组织变迁的社会文化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要注意到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组织和制度的剧烈变迁时期,国家的角色、组织的变革以及社会规范的特征都并不稳定,研究者应当随时注意到西方组织理论框架对于中国问题的切合性,在反思和实践中探索解释的逻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组织研究中,有三个研究思路可以作为探讨的主题。

1. 组织研究的国家-社会框架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家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践对原有的总体性社会造成了冲击,改变了社会资源的分配路径和结果。但我们要注意到,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规则制定等居于主导地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比如对非盈利组织的研究表明,组织在合法性获得的支持方面仍然强烈地依赖于政府,以至于出现组织结构与政府科层体制的“同构”以及“组织的外形化”趋势。但同时应当看到,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也在逐渐增强,在某些领域对政府权力形成了限制。因此,在中国的组织研究中,国家-社会关系是一个有用的框架。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组织与政府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和制度化关系应当是研究的重点,这也是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沃德对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他认为,以往对中国的研究要么是一个集权主义的框架,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非个人化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政治控制,认为社会成员之间是原子化的,缺乏私人联系;要么是社群主义的框架,强调多元的利益群体是社会的构成基质,各个利益群体会通过利益追求和政治认同集聚,反抗国家的集权统治^[11]。这两种视角应用到中国都有过度简化的嫌疑,沃德则希望用新传统主义的说法来替代以往对中国研究的不足。沃德的突破点在于他试图在在传统视角中分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找到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就是庇护关系网络,国家通过庇护关系与社会建立了一条通道,而个人也通过庇护关系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内,它反映了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来自社会的策略性行为,社会成员借助传统的渗透力很强的社会关系网突破非个人化的政治控制,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张静对国有企业单位中职代会的研究则体现了另一种思考,她认为,国有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最终成为连结职工与国家的一种中介机制,张静把单位所具有的这种特征概括为“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也即“政治动员(利益组合及代表)和行政控制(管理执行)两种功能由一种组织渠道承担。”^[12]当然这些研究的概括也都还有过度简化的嫌疑。在对中国组织的研究中,仅仅用国家-社会的框架还不够,还应当考虑到具体的组织行为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

2. 权力依赖的社会文化网络

在对中国的组织研究中,我们认为还应该看到组织的权力依赖关系和社会文化的相互嵌入关系。所以单独的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主义或其他组织理论都还不足以解释真实社会中的

组织现象。比如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讨论制度的作用时,认为私人组织与政府权力相关性较小,故较少受到制度的影响。但中国社会中,尽管市场体制的转轨已有时日,市场企业仍然常常直接或间接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这是一种社会惯性或文化的力量。又如,交易成本学派对市场等级的划分是一种二元性的,要么是市场,要么是组织(等级制)。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着市场和等级之间的组织形态,比如家族制或地方领袖制,与西方的组织理论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由于社会文化的特殊形态造成的结果。

资源依赖理论的组织权力关系必须放到社会文化网络中来分析才有说服力。杜赞奇在分析中国的乡村水利组织时,发现文化网络在社区组织中的作用,他指出,文化网络强调的是对组织系统中权力赖以生存的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它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13]。刘世定等对合同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乡镇企业中大量的合同是一种嵌入式的合同形式,在合同订立之前及之后都有人际关系的机制在起作用^[14]。虽然中国的组织形态已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但在今天组织的权力关系中,仍不难看到,许多的社会文化关系仍在组织的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合法性机制与组织的实践

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的合法性需求,但我们应当看到组织的实践能动性、组织对环境的改变和控制或者说组织突破现有规则、创造新规则的能力。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只局限于对组织的静态特征的把握上,而将视角转向组织的变迁或者制度创新上,这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大量发生的现象。

在考察中国的公共组织或者非盈利组织如学校、医院时,我们发现,组织会为了获得某种合法性而创立制度。比如高校为了卫生检查而设爱国卫生委员会;地方的“送温暖”机制等,这是制度环境对组织形成的压力和要求。但是,组织也会通过改变环境,运用非正式的途径变通规则,以服务于组织或个人的利益。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社会政策在颁布执行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部分扭曲或受到变相抵制。这说明,组织在面对外部规则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而组织的策略选择

又常常嵌入在上面所述的社会文化网络中。

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组织的新的视角,但作为一个各自独立的组织流派,两者皆有其局限之处。资源依赖理论过于强调组织作为政治行动者对环境的改变和影响,过于重视组织外部的策略机制,却忽略了制度、文化信仰以及相对较少分析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机制正确地看到了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嵌入,但是对组织能动性的忽视、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忽视又常常为研究者所诟病。我们应当看到,不同的视角应当可以相互融合,以增强理论对真实社会的解释力,这是理论建设的目标。

此外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我们还应时刻注意到西方组织理论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性,需要注意到组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与社会文化因素。中国社会组织既有与西方社会共通的现象(这是理论可以相互融通的依据),也有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特质。保持研究和实践过程中的自觉反思应该是每一个研究者为之警醒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Pfeffer, Jeffrey Salancik, Gerald.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1978. 5.
 [2] Meyer, John Rowen, Bri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 340-63.
 [3] DiMaggio, Paul Powell, Walter.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42: 726-43.
 [4] Donaldson, Lex. *American Anti-management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A critique of Paradigm Prolifer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W·理查德·斯格特. *组织理论* [M]. 黄洋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6] Peter L Berger,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7.
 [7] Tolbert, Pamela Zucker, Lynn.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3, 28: 22-39.
 [8] Powell, Walter W DiMaggio, Paul J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4.
 [9]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78. 85.
 [10] Zucker, Lynne G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 New York: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4.
 [11] Walder, Andrew.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2.
 [12] 张静. *利益组织化单位: 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5.
 [13]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M]. 王福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33.
 [14] 刘世定. *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J]. *社会学研究*, 1999, (4).

The Power and Legitimacy of Open Organization

——Compare with Organization Theor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

DENG Su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ST,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Resource Dependency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 are two important sections in organization study (OT).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pays more attention on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strategy and agent. Whereas New Institutionalism concerns with why more and mo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nds to resemble each other. How to combine with the two ways of examination is very meaningful to OT study. And also to Chinese OT stud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approach's combination.

Key words: Resource Dependency; New Institutionalism; legitimacy

责任编辑 蔡虹